

高考新政下,高中转型准备好了吗

■郑方贤

随着新一届高中生走进校园，上海的高中学校已经彻底告别了“3+1”高考模式下的教学时代。实际上从 2014 年秋季开始，高中学校就已经开始实施新的培养方案了。从媒体上可以看到，去年暑假 4 万余高一学生走出校园和家庭，涌向各类社会实践基地；今年又看到众多学生投身研究性学习。凡此种种，两年来从部分学生到全体学生，从部分年级到全部年级，高中学校的培养一直处于改革转型之中。

2017 年开始实施的“两依据一参考”考试招生改革虽然是针对高校的招生新政，但其实质意义，是推动高中教育的改革。

长期单一的评价，异化了基础教育的定位和作用。但高考新政之下，作为教育主体的高中学校，在校园空间和教师投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，是已经顺利完成了培养模式的转型呢，还是以既有的办法“化解”了所有的新要求？

从近几年的高校招生看，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有机会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。因此，与其说是高校招考改革，不如说是通过评价指挥棒引领高中教育转型发展。这次改革将使我们的高中教育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、更加体现教育的价值、也更接近于现代教育。

在高考新政主导下，伴之以高中学生的学业评价办法和综合素质评价办法的实施，高中教育要强化思想、行为、知识等基础培养，要鼓励特长、兴趣、爱好等个性发展，要以过程性的培养和评价替代单一的学业分数的终结性评价。

从法理上讲，高中教育属非义务教育，具有极大的办学多样性和发展空间，理应成为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择性的教育。

但是长期单一的评价模式，使得学校的教育活动都必须与高考的评价目标一致，否则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就会受到质疑，因此，高中学校同质化严重。即便有些高中在创新学习、实践培养、社会服务等方面尽可能地为学生成长创造条件，但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内容而言，终究只是点缀而已。

久而久之，不仅是高考评价之外的素质教育、学科培养没有了机会，即便高考科目的培养，所有学校的课程类型、教学内容、培养方式也因此而高度一致，从根本上异化了基础教育的定位和作用。

长期单一的评价还严重固化了学校之间的差异。以升学成绩作为主要评判指标，给予学校不同层次的重点高中或高中示范学校等称号，其主要的政策利益是使这些高中能获得更大范围的招生权利，制度性地建立了从生源入口到出口的体系，确保了学校升学质量的相对位置。

而这种位置的稳定性也固化了整个教育界和社会对学校办学的认知，分析近 20 年来的高中教育基本面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特点。与此相对照

的是，每年招生结束，就会有众多学生落入无人待见的普通高中，而学校的分层无情预示着这些 15 岁左右少年还未开始的人生将黯淡无光，这更是违背基础教育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。

这次自上而下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，为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正本清源、改革创新建立了极好的政策基础和环境。直接作用于高中培养评价的改革方案，以及基于教育综合改革背景的高等教育改革，比如大学的分类管理改革等，为高中教育接轨高等教育、探索多元培养提供了路径。而高中学校对于这次改革的正确认识和机遇把握，将重新确立其自身的地位，同时改变高中教育的现状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但是，不知作为教育主体的高中学校是否已顺利转型。

高中教育的转型，除政策和社会环境支持外，在现有人财物资源投入滞后的情况下，要以制度创新来推动改革。从学生培养的理念、方法到目标重新进行梳理、建立完善的培养制度，以适应现代教育转型发展的要求。

具体来讲，高中教育的转型发展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特别关注，即培养的基础性、教育的完整性和评价的过程性。

我们面对的高中学生普遍是 15-18 岁，正是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，身体和心理趋向成熟。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和法律意义上还不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，但面对同伴和身边的事物，在思想和行为上竭力尝试主导与掌控。同时由于大学升学的标准和要求，他们还承担着强化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的重担，或许还有必要的职业体验和职业能力的培养。

因此，对于这一生长阶段的学生，要满足他们身体、心理生长发育成熟的需求，培养他们独立自主、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，要传授他们足够的知识、提高探究学习的能力。

高中学校培养的基础性首先应该是实现上述要求的教育，使得学生在一个模拟的微型社会中体验成长。

高中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与同学而不是与家人在一起，如果是住宿制学校的话，更是要独立面对校园生活和同学群体，除了班级有班长、课代表等，寝室还有寝室长，个体的生活融入于有组织的集体中。学生可以从满足兴趣爱好和领导能力培养角度出发组织社团，也可以参与学生会等组织，规划和管理学校的公共事务，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。学生要学会以组织的方式处理同学间的各种诉求、冲突，体验民主与规则。

通常高中校园的空间比初中明显扩大、设施也比较齐全，足以满足学生运动发展、兴趣培养和动手能力提高的要求，使得他们不会因学校生活而制约自身的个性爱好与发展；同时高中的学业与初中也有极大的区别，不再是以模仿为主，而是注重知识体系的学术性、完整性和逻辑性，并创设各种环境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高中教育还要安排大量的社会实践与职业体验，使得同学们对未来的社会



环境和职业有初步的印象，以规划自己的专业学习与工作路径。

高中学校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要提供学生如上所述的成长平台，这也是判断其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学校的基本要素。

合适的学校培养方案设计，应该由健康、知识、能力、责任四大板块组成，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有必修课、选修课和活动，而非整齐划一的十门课程，学生的选择和自我完善都体现于此。这些都应是制度化的存在。

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完成义务教育但还没有踏入社会，他们未来的发展难以预料，即使大多数学生升入大学，他们也无法很早就确定是选择基础学科、应用学科、抑或职业教育，这也定位了高中教育要培养学生最基础的知识 and 能力，以满足未来的选择。

高中教育的完整性就在于要提供足够丰富的课程和教育模式，并且让学生在课程教育的选择过程中学会选择。由此，审视我们现有的课程计划，会发现十多年的基础教育始终以语、数、外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十门课程为主体，拓展课和学科研究类课程占比极少，极大制约了学生对于知识、专业、学科、社会和世界的认识，更是无法反映学校的特色和价值指向。

合适的学校培养方案设计应该首先满足全面培养的价值导向，比如健康（身体与心理等）、知识（知识与技能等）、能力（实践与创新等）、责任（情感与价值观等），再根据培养领域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，将课程和实践分年级有机安排，这样才能充分实现高中教育要求、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生个性发展的有机融合。

多年来，许多高中学校开展了综

合素质培养的探索，并逐渐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，现在需要加以制度化。

学校可以将培养内容区分为核心的素养培育与拓展的能力训练，其中核心部分以政府规定的课程和内容为主，而拓展部分则以学校自行探索与组织的课程和内容为主，以满足学生个性而全面的发展需求。同时，这种以素养领域分类的培养方案设计，有助于学生建立从整体到分类、再从分类到整体的成长认知，也是学生通过课程知识、认识专业、职业、社会及其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认识和体验路径。

教育的完整性落实到课程计划并实施，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根本保障。课堂讲授、现场体验、动手实践、主题活动等方式都是课程实施的内容与过程，学生都将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。而对学生在课程和活动中进行过程性的评价，并统一反映在最终的评价结果中，才有助于教育目标的实施。

要实现这样的评价方式，首先要对教学活动（即课程或课程化活动，以下均称为课程）的“量”和“质”进行界定。

所谓“量”是指完成课程所需要的总学时数（或平均周学时），而“质”是指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，两者合成一个指标称为“学分”（也有把平均周学时直接换算作学分的情形）。课程的设计，需要目标清晰、过程严谨，既要满足培养的功能需求、也必须遵守教育学的规范要求，那种把一次讲座也称为一门特色课程的情形是不应该出现的。

其次，要对学生在参加课程群体中的相对表现及成果进行评价。如以体验为主的课程可以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区分，也可以在其中再选拔部

分学生评价为“优秀”，但要确定比例；对有一定持续性的课程，可以综合日常表现、作业及考试结果而给予不同的等第评价。当然也可以采用传统的百分制、再转换为等第的评价方式，虽然存在不够稳定的情况，但是对于学生在群体之中所处的位置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体现。

具备上述基本信息后，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总的评价，采用的方式通常称为平均绩点（GPA: Grade Point Average），其计算方法是将某学生所修的每门课程的“学分”乘上所获得的“绩点”累加起来，再除上所选课程的总的“学分”，即为平均绩点。

平均绩点就是学生参加所有学习活动所获得的综合评价（平均成绩），改变了过去只是以高考课程的最终考试分数作为评价的方式，综合反映了学习过程与学校的培养目标达成程度，从评价制度设计上与“两依据一参考”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相一致。

高中教育是学生进入社会前的预备教育，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价值。既要着眼于基本素质的培养，也必须传授和训练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能力要求，所以在教育观念与思想、课程体系与内容、教学方法与评估等方面，都必须服从这样的价值目标。

上海的高中教育有很好的基础，最近若干年里生源人数又处在低位，正是整体推进高中教育改革的极佳时机。高中学校自身要在培养的基础性、教育的完整性和评价的过程性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培养改革，满足学生的多元发展与成长需求，提升高中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，以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，达成教育现代化的目标。

（作者曾任复旦附中校长现为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）

大学来了“00 后”

■见习记者 朱颖婕

上海交通大学刚刚入学的 2016 届新生中，赫然出现了 26 位“00 后”的身影。据了解，其中有 5 人入学时还不足 15 岁，年龄最小的才刚刚过完 14 岁生日。

这些本该刚升入高中的“少年大学生”都有着特别的求学经历，而跟“哥哥姐姐们”做同学，这些“小朋友”们有着自己的想法。

现在的超前是因为牺牲了童年

入学不过 10 天的小强俨然已是全校的“明星”，作为年龄最小的新生，他上了好几次“头条”，对于年龄为自己带来的关注，小强的态度超乎想象的成熟：“‘年龄小’从来就不是我的标签，我没有任何特殊。”

小强提到，自己之所以会提前上大学，是因为上小学的时间过早。由于家乡是一个小县城，他在年仅 3 岁时就已经可以成为一名小学生了。过早入学导致他在头两年完全跟不上学习进度，直到三年级情况才有好转。

小强的故事引起了在场很多人的共鸣，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也是入学过早，有些人还经历了跳级和提前参加高考。或许很多人会把他们称为“幸运的孩子”，因为“年轻就是资本”“起点比别人高”，但在他们心中，缺失的童年时光始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。来自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的小雪说：“我们虽然年龄小，但是竞争对手仍然是比我们大 2、3 岁的人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优势，相反，还比其他孩子少了很多玩耍的时间。”

一视同仁才是最好的照顾

来自工科实验班的小宇道出了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：由于从小到大身边的同级人都不是同龄人，他们在与“同学”相处的过程中，几乎都遇到过问题和烦恼，这也造成了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，比一般人更加敏感。

小宇说，进入初中后“同学知道我年龄小以后，就很自然地认为我懂的东西比他们少，很多事情做不了，所以，他们对我的忽略和疏远很明显”。为了尽快融入集体，她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活动，“一开始有点困难，时间长了以后才好”。小宇（化名）则提到，由于年龄小，他收获了很多“哥哥姐姐”，他们是很照顾我，但是并没有把我当成同龄人，所以我的‘知己’很少”。

相比小宇和小宇，小琪受到的“区别对待”更令人惊讶和心疼。在回忆因年龄小在小学里遭受校园暴力的时候，小琪数度哽咽，所幸她在初中时遇到了很多温暖的朋友和老师，性格才逐渐开朗，成绩也突飞猛进。

面对之后的大学生活，这群“00”后只有一个愿望：一视同仁就是最好的照顾。他们表示，他们已经具备了照顾自己的能力，在与同学交往方面，也早已积累了很多经验，“我们从小就知道不能因为年龄小给自己设定界限，我们都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其他人做到的事”。

年龄是前行的动力

这群“少年新生”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从不为“走在同龄人前面”而沾沾自喜，也不曾以此为借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虽然年龄为他们带来过一些烦恼，但这也是他们证明自己、继续前行的动力。

来自医学院的小明说，年龄小有一个“好处”，那就是在遇到挫折后，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改进。小强则认为，比同龄人早几年进大学，也就意味着早几年读硕士、博士或踏入社会，他希望能够利用“年龄优势”继续深造。还有一些新生表示，为了不让别人用“年龄小”作借口看轻自己，更是要“卯足劲”做出一番成就来。小画直言，大学的课业难度高了很多，学习竞争压力也比较大，“身边的‘学霸’、‘大神’更多了，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在竞争中不掉队”。

当问起如果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他们是否还愿意在这样的年龄读大学，大多数人的答案是“不后悔”。“过去所有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，我不后悔之前走过的路，如果说有什么愿望，那我希望在大学 4 年后，能收获一个更加丰富、善良、高贵的自己”，小宇这样说。（应采访者要求，文中学生均为化名）



大学“青椒”不只有诗和远方,更有眼前的压力

■马臻

前不久，43 岁的教授师长喧上了新闻。这位在 2010 年被上海财经大学引进的青年教授被校方告知，在“常任轨”教授 6 年聘用期满后，不再续约。据悉，该校从 2004 年以来共引进了 200 多名“常任轨”教师，至今合同到期的 71 人中，只有 19 人被授予常任教职，其余的均已离职。

时下，不少人认为大学教师很轻松，不用坐班，还有寒假、暑假。一个大大学教职还有上百人申请。但其实，大学“青椒”（青年教师）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和压力。以上这则新闻，仅反映了“冰山一角”。有青椒不禁感慨：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，还有眼前的压力。

新进学校，科研启动慢

有媒体报道了复旦大学 38 岁的特聘教授张远波，强调他科研成功的背后，是他所在的物理学系给年轻人的“容错空间”——张远波“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组建实验室、培养学生，也无需考虑论文或者是任何其他功利的目标。”但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也恰恰反映了青椒科研起步慢的现实。有人说，像张远波那样的“大教授”都花了三四年，更不用说普通青椒了。

那，为何大学青椒科研启动慢呢？首先，做科研需要有物理空间，但很多新人刚进校时，实验室都没落实，只能“蜗居”在别人的办公室。例如一位青椒入职前，系里说好给他“两间房”，但报到的当天，他发现两间房里坐着别的老师和学生。这样

的情况毫不鲜见。因为近年来不断有新教师进来，但院系的用房面积往往没有同步增加。

其次，做科研需要经费，但普通青椒获得的启动经费往往不宽裕，而且是分批调拨的，这显然不利于及时购买或者搭建实验装置。

再次，普通青椒入职后等到被批准成为研究生导师，也一年甚至几年过去了。院系不断有引进人才进来，但研究生的名额没能及时增加，因此导师多、学生少并不少见。即便招到个把研究生，质量也很令人担忧。

加之青椒入职后需要熟悉环境和办事流程，导致了新进校教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科研正轨。

“沉默期”文章、职称都很难

虽然很多人都谈到学术评价不能“唯论文是从”，但论文在目前仍然是学术界的“硬通货”。以张远波为例，他入职三四年后才开始发表“复旦制造”的论文。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相当普遍。

科研启动慢必然会导致发文章慢。有一位青椒坦言：“我进校后，搭建装置就花了两年多时间，怎么能‘立竿见影’地出文章？”

其次，以前读博士、做博士后时，有一些科研的点子由导师提出，并且论文有导师的把关和“加持”，更容易发表；而独立工作后，做新的课题，也没有导师可以依赖，需要靠自己。

而且，论文要是只是投国内学报，那文章很快就能出来，但要是想在海外刊物发表“大家伙”，就需要反复验证、穷尽各种实验可能了。

其实，发表一些“短平快”的“小文章”，能给自己“充饥”，但院系领导显然不满足。毕竟，现在重点大学更强调“标志性成果”。而试图“几年磨一剑”，要是几年后什么也没发出来，又怎么向用人单位交待？

做科研、发文章难，还在于青年教师并非专职博士后，而是要在教学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。要同时把科研和教学做好，非常困难。

有相当多的大学青椒以讲师、副教授身份进校，将来会面临晋升职称。高级职称不但和工资级别挂钩，更是学术水平的外在表征，也是申请项目、获取学术头衔的重要保障，历来是“兵家必争之地”。

青椒进校后必然会经历一个“沉默期”，即花了两三年，甚至更长时间搭建装置、训练学生，暂时看不到科研产出。这时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早几年进校的同事们度过了“沉默期”，正带领着学生源源不断地出文章。

等过了几年自己也出了文章，就会发现评职称并不容易。

国内高校评职称就像“计划经济”，由人事处把名额“分配”给院系。有的重点大学，每年内部晋升教授的名额不能保证每个系都能分到。

而且评职称未必取决于你有多强，而是取决于院系分到几个名额。更何况，还存在着“论资排辈”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因素。

最近几年，国内一些高校还推出“六年非升即走”或者“常任轨”的制度。这在促使青椒尽早步入正轨的同时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在六年内能出很多成果并顺利留下来。

家庭和事业发展矛盾普遍存在

做科研的人都明白，做科研并不是“朝九晚五”的工作。如果别的研究者在“动”，而你“不动”，那就落后了。并且，要想获得更多的科研资助，就必须“出东西”，因此晚上和周末常常需要加班。但这样必然在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上“加了一把盐”——晚上和周末你到底是陪家人，还是去学校加班？往往，青椒在忙着家庭事情时，对自己的工作进展会有一种焦虑，又会有种被现实掣肘的无力感，特别是想到别的同事正在实验室“浴血奋战”。而如果去学校加班，那么对家人会有一种愧疚感。

家庭的压力对女性青椒尤为沉重。她们白天在学校忙着工作，晚上回到家围着家务、小孩“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啊转啊转”，同时还要用微信指导学生实验细节……而这时，“六年非升即走”的时钟正一刻不停地转动。

面对困境不忘初心坚持前进

工作上的压力，再加上家庭和事业发展的矛盾，使得青椒普遍觉得累。特别是在当下方方面面逼着青椒“快快成长”的形势下，青椒就像是正在拼命顶出土壤的幼芽。

时下，国内不少大学正在忙着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“世界一流学科”，而青椒面临的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有不少高校开始“发力”。有报道指出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吸引海归的原因在于三点：纯粹的学术环境、没有记工分似的硬性考核、细心体贴的后勤保障。而我所在的复